

1881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年度事件：朝廷下旨中途召回留美幼童

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三十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各有一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年龄在十到十六岁间）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十五年，另加两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二十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须不畏艰险与流言，决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伴随着李鸿章对留美幼童计划进展的失望，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留美幼童分三批启程，于同年秋返回中国。至此，始于1872年，历经十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后来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然而，容闳所不知道的是，李鸿章本就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强力主张者——1881年，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然而，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显然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旧体制的掘墓人。对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尽全力顶了近十年的朝野舆论压力的李鸿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种情何以堪？在下达回撤谕旨的那一刻，那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已成为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容闳的理想：造就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

【鲁迅式的痛苦】

1847年，不足十九岁的容闳远涉重洋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若干年后，久历

欧风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时代启蒙之后的痛苦：“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 Joseph H. Twichell 牧师所说：“（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

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不抱希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李鸿章之梦：培养新一代的糊棚匠

【陈兰彬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清廷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幼童事业的不满，称：“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次年二月，陈兰彬回奏，描述留美幼童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幼童：“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唯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唯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结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詎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

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将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留美幼童之痛：等待我们的只有荒漠和枯萎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十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象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

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慨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结语：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容闳是输家，他破灭了理想；李鸿章也是输家，新一代的糊棚匠没有成长起来；幼童们同样是输家，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场畸形试验的牺牲品。

那么，谁是赢家？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赴美留学，后来在其自传中

回忆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里至为矛盾。”

这种矛盾终于在1911年成为现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并以此为议和的指导方针，最终促成南北联合推翻了清廷。

此种情形，容闳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就预见到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相关言论

曾纪泽：幼童未读圣贤书即出洋，对中国没什么好处

陈兰彬、吴嘉善等人热衷洋务，当时称为开明，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接受留美幼童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曾国藩是幼童出洋的重要推动者，其子曾纪泽办理外交多年，熟知中外情状，居然也明确反对幼童出洋：“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速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

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总理衙门：幼童改变了中国形象

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前，他们的美国校长联名致函中国总理衙门，给予幼童这样的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为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

李鸿章责怪容闳：为何任由学生归国而不进行抵制

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后，容闳在天津同李鸿章会面，谈及此事，李鸿章责

问：“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容闳说：“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反驳道：“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归也。”对此，容闳极为惊诧，“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这或许可以作为此一事件中李鸿章矛盾心理的一段注解。

幼童们回国后对美国的怀念

幼童们返国后，现实环境的压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集体呈现出对美国留学生涯的怀念。譬如，幼童罗国瑞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我忆起在西海汶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幼童）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

幼童温秉忠则回忆说：“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1881年返华之日），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

资料来源：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潘向明《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